

[美] 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 著

从右到左

我的自传

FROM
RIGHT
TO
LEFT



从右到左

——我的自传

〔美〕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 著
竞 耘 芦 荻 生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218365

(京)新登字021号

From Right to Left
An Autobiography
by 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

Lawrence Hill & c Company 1983

根据美国劳伦斯·希尔出版公司1983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今晨

封面设计：王麟生

从右到左——我的自传

〔美〕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 著

竞耘 芦荻生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3.125 字数：289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12-0482-9/K·99 定价：5.30元

序

这是一本写真人真事的书。作者出身豪门，后成为美国共产党员，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麦卡锡时期，他遭到美国当局的残酷迫害，被判刑坐牢。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挖苦和讽刺，说他是“百万富翁共产党”。若干年后，他写了这本书，回答对他的各种挖苦和讽刺，并叙述了他的家庭背景、少年时代、思想转变、成为共产党员的经过和美国当局对他的种种无耻迫害。

他的全名叫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范德比尔特是他的外高祖父，19世纪美国的头等富豪。从纽约经过布法罗市到芝加哥的铁路是他家修筑的，是他家财产的一部分。1885年他的外祖母继承那份遗产时，其数目几乎等于当年纽约州政府全年的预算。他小时候，家中共有父母兄弟姐妹六人，却雇佣了十五个佣人和两个车夫。大学毕业以前，他过的是阔少爷的生活。毕业后，到伦敦经济学院进修，上了当时著名左派教授哈罗德·拉斯基的课，开始理解有阶级，有剥削，有帝国主义。

他从伦敦回美国后，到太平洋学会工作。这是一所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沿太平洋各国的情况，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国。他分别于1929年和1931年两次来华，亲眼看到当时

中国如何贫困，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悲惨，西方人在中国如何横行霸道，看不起中国人。又看到西方人如何剥削中国，从中国榨取大量财富。这两次中国之行，给他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使他开始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从此，中国问题成了他专门研究的课题。

他回到美国后，查阅了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档案，并利用他的社会关系阅读了美国各银行对华问题联席会议的记录。他花了一年半时间写了《美国对在华国际财团的参与》一书。1934年，在他的主持下，太平洋学会出版了《东方的帝国》文集，其中关于美国在华的财政经济活动那部分是他写的。同年，还出版了他主编的《太平洋地区经济手册》。以上三本书开创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方向。过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般都不联系真正的实际，更不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情况研究帝国主义对华关系——他如果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至少也是很早就这样做了。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出现了新一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和一般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同，他不满足于只研究问题，而觉得既然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灾难的祸根，就应该采取行动来揭露它，反对它。因此，他参加了美国的进步运动，最后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这本书中写的关于麦卡锡时期作者被迫害的经过和情景，既生动，又具体。在这期间，他备受折磨，先后被国会、大陪审团、法院传讯，最后还是被判刑坐牢。出狱后，美国当局又说他的夫人是加拿大人，没有美国国籍，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特务对他的家进行严密监视，使他的一些朋友对到他家里去看他有顾虑。他只好把房子卖掉，想另租一套公寓居住，但是房地产公司得知他的身份后不愿意租给

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美国，移居墨西哥。就在墨西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也没有停止对他进行骚扰。上述情况，也正是对于美国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的很好的讽刺。

作者的名字，对现在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说来，也许已经不很熟悉了。但是不少老一辈的革命家，如陈翰笙、冀朝鼎等，却是他的好朋友。我和他也很熟。“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后，他支持中国人民要求抵抗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消极抵抗、积极反共和贪污腐化。日本投降后，美共成立了远东局，他是负责人，做了很多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持中国革命。解放战争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在美国的纽约中国银行等机构，其资产属于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打电报给他，问他是否可接受我方的委托，办理动用上述机构的资金的事宜。他慨然应允，并曾向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正式登记为新中国的代理人。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一方面使我们可以从中间了解美国许多具体情况，同时也表达我们对凡是帮助过我们革命斗争的国际朋友，是不会忘记的。

唐明照

1992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 1 章 第五大道645号	3
第 2 章 莫希干湖	17
第 3 章 典雅优美的“高草地”	26
第 4 章 树、枝与叉	39
第 5 章 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	53
第 6 章 哈佛大学的课外活动	66
第 7 章 决定方向	81
第 8 章 社会党	94
第 9 章 职业和旅行	107
第 10 章 中国和菲律宾	117
第 11 章 关于远东的更多的情况	132
第 12 章 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147
第 13 章 政治与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158
第 14 章 红山	169
第 15 章 关于帝国主义的课程	181
第 16 章 向左转	193
第 17 章 共产党	209
第 18 章 美国和平运动	237
第 19 章 20世纪40年代	256
第 20 章 情况热闹起来了	266

第 21 章	我藐视你们	280
第 22 章	麦卡伦审讯	295
第 23 章	政府的客人	305
第 24 章	到墨西哥去	330
第 25 章	拉铁摩尔案件	337
第 26 章	在墨西哥定居	351
第 27 章	我们的女儿索奇蒂	363
第 28 章	使人回忆起过去的事	370
第 29 章	印第安之夏插曲	378
第 30 章	新的爱好——考古学	393
第 31 章	今天会议的日程	404
我的感谢	409

前 言

1950年5月15日的《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本期刊有：《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百万富翁变成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家杂志在“国内事务”的标题下，用两页六栏的篇幅试图向读者回答这个问题。它没能做到这一点，但却使问题陷入了困境。

“从弗雷德里克·菲尔德的家世和环境来看，他理应是一个华尔街的经纪人，一个铁路上的高级官员，一个经营农业的绅士，或者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青年，除了调制勉强可以喝的马丁尼酒以外，在生活中无所事事；实际上，他应该是任何一种人，而唯独不应该是他真正属于的那种人——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他在美国赤色分子们严格的等级结构中看来仅次于最高层的领导。”

同期上署名“编者”的文章加深了问题的神秘性：

副编辑哈罗德·拉文采访、报道共产党的活动已有17年了，但他从未遇到过要描绘一个共产党员百万富翁的超乎常理的事。拉文访问了20多人，这些人从弗雷德里克·菲尔德一出生下来就认识他，所有这些人，即使是

D 1548 / 20

菲尔德最严厉的政敌，都对他使用了“有教养的，和善慷慨的，真诚的，现实的，非常好的人”之类的字眼。本期《新闻周刊》首次登载了关于范德比尔特海军准将玄孙的全面报道。他的个性和他的政治见解是大相违背的。”

这些话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既是一个正派体面的人同时又是一名共产党员。

《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1950年9月9日）和《生活》杂志（1950年7月31日号）还有其他的出版物也发表了长文试图解释在那个乖孩子——弗雷迪·菲尔德身上发生的事。《生活》杂志还刊登了一张我的照片：我坐在书桌旁抽着烟斗，书桌上放着银行结单和装烟草的口袋，在我后面的书架上放着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我的大女儿莱拉的画像，此外还有8听邓希尔（Dunhills）（My mixture）All101香烟。《星期六晚邮报》的插图把我描绘成表情严肃，正拿着一些文件去参加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虽然他们都搞了些中伤人的流言蜚语，但两篇文章都没能答复《新闻周刊》提出的问题。

几十年以后，现在该由我来作出回答了。

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

第 1 章

第五大道645号

我的母亲莱拉·范德比尔特·菲尔德，父亲威廉·B·奥斯古德·菲尔德，他们拥有三处住所，其中令人迷恋的两处是我母亲的，第三处属于我父亲。我于1905年4月13日降生在我们城里的那所迷人的房子里。但是人们不在13日庆祝我的生日，而是在14日，他们对我隐瞒了13这个日子。事实上，直到50年以后，当我为了申请在墨西哥的居留权而办理出生证明书时，13这个日子才引起我认真的注意。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要么就是以为是市政厅搞错了。后来，对13日这个日期又做了两次核实，我才明白我不是按照我母亲计划的日子降生到人间的。她有她的迷信。比如，她不在梯子下面走；黑猫总是有点不吉利；在饭桌上，她从不坐在第13座位，她认为星期五也有点不妙，诸如此类等等。她把我的生日改为14日是为了使我的一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在纽约的房子在第五大道645号，位于第51街和第52街之间，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以北一个街区。住所的一部分地方后来被贝斯特公司占用，再后来又在上面建造了奥林匹克塔楼。在我童年时代，这所房子面向商业区一边挨着联合俱乐部——我父亲当然是俱乐部的成员了。在非商业区

的一边是另一座大厦，北面就是卡提尔大楼。这两座建筑是第五大道两侧仅存的1905年建筑景观。

对大部分童年时代都生活在那里的小弗雷迪·菲尔德来说，第五大道645号就是世界的中心。他家的房子位于曼哈顿的绝对中心，而曼哈顿就是纽约（其他的几个区根本算不上什么），纽约又是全美国最重要的城市，美国毫无疑问又是世界最伟大的国家。通过一些朦胧模糊的认识过程，这个小家伙很快就明白了他不仅是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且是生活在世界的顶端。第五大道上有几所大房子，其中有两所正对着他家，占据了整个街区，这两所大房子就是他们家的。他总是被仆人簇拥着，除了自己打喷嚏以外，任何事情都有人伺候。他家有一所乡村宅邸，还正在建造另一所。他是白人，是圣公会的成员，他是富人。一句话，他是享有特权的、是优越高贵的。他远远高过他在大街上或是中央公园里见到的任何一个人。难道说还有什么人比他更幸运吗？

经过了漫长的时光，经过学校、大学、旅行、读书以及接触了他过去认为比他低下的人们以后，弗雷迪·菲尔德才明白了世界是圆的，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地理上都没有中心。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他是如何才取得这种认识的。这个故事必定得从第五大道645号那处漂亮的住所说起。

我的外祖父母在城里为他们的儿女准备了房子，除了我们的之外还有两所，它们相邻地坐落在离第五大道不远的第91街，它们分属于我妈妈的两个姐姐——阿黛尔·伯登和埃米莉·哈蒙德。这两座房子实际上已到了郊区，它们具有着我家住宅所缺少的一种高贵典雅的风格。这两座房子有车辆的入口，你可以直接从马车或汽车里走进房子，而不必暴露于比我们权势低的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

我母亲的弟弟马尔科姆是这种家庭本应具有的正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我从没去过他的住所，而且直到我为了写这本书必须做一些家庭调查的时候为止，也从不知道他有一所住宅。在我们家里很少谈论他，我对他了解得很少，可能一年只见到他一次，那还是在他每年对我母亲做一次正式拜访的时候。由于不准孩子们偷听有关对他的议论，我们当然更感到好奇。很明显，他不只是连骷髅社^①都入不了的笨蛋，甚至于连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的愿望都没有。不过，即使马尔科姆舅舅缺少适当的教育，如果他提出要求，他还是可以从家族中找到许多可干的事，但是他似乎宁愿游手好闲，所以在我们孩子看来他显然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人们对我们说他在年轻时抽着烟睡着了，被烧伤了，可能是因为烧伤感染而死。我一直相信这个说法，可是曾经和我一样听过同样说法的我的一个表哥最近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自传《约翰·哈蒙德大事记》，书中说他后来发现马尔科姆是酗酒死的。我的结论是：我舅舅几乎是有钱的浪荡公子的一个极好的典型。然而在我的童年时代，他只是使人们注意到，特权者并不必然就是好人。

穿过第五大道，在我家的对面有两所大得惊人的宅邸，每一所都占了半个街区。其中一所属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另一所属于他的姐姐我的外祖母埃米莉·范德比尔特，她嫁给了我的外祖父威廉·道格拉斯·斯隆。大约每个星期，我都被拽着过马路去拜访一次我的外祖父母，要么由我妈妈陪着去做一次简短的拜访，要么是去吃一顿令人生厌的饭菜。后来，吃饭的事推迟到我懂得规矩以后。这所房

^① 骷髅社是当时耶鲁大学最有名的学生社团。——译者

子、房子的主人和他们的宴会都是令人生畏的。

如果是去吃饭，我们这些外孙外孙女们都必须梳洗干净，穿着整齐，经过演练。从645号出发之前，我们都要经过检查，看看是否洗过澡。吃这顿饭简直是活受罪。一个男仆人穿着小歌剧队的制服，戴着白手套，站在你坐的椅子后面。通常小孩的一份菜总是最后上，所以当我们刚开始举止得体地把精美的食物放进嘴里时，大人们也就吃完了，于是那个仆人就飞快扑到前面收走了我们的盘子。每当我们在那里吃饭时，那些可怕的小北京狗躺在绣花枕头上警觉地观望着，它们必定是刚刚享受完一顿特别可口的晚餐。

在外祖父家聚会时的谈话主题都是拘谨而肤浅的，诸如什么刚从乡间别墅的温室里送来的油桃、蜜桃和葡萄不是比去年收获的更大些吗？人们对上星期天帕克博士的讲道会怎样评论呢？那段音乐美吗？他们唱什么了？通常也要谈到有关孩子的事，这时我们就都不参加了。他们的谈话没有一点严肃认真的内容，我不记得有过任何热烈的讨论，没有任何人因为谈话而激动，每件事都是走形式的，彬彬有礼而又陈腐平庸。

我记得在那里有一件事使我多少感到有点高兴，这件事与我外祖父有关。我外祖父的父亲是第五大道的W与J·斯隆家具店的创办人之一。那天，我外祖父一年一度去伦敦旅行带回来的服饰用品运到了。我和我哥哥奥斯古德被叫到老人的书斋，他正在检查摊在他面前的许多华贵物品，大量衬衣，袜子，手帕以及那个年代的绅士们从伦敦服饰店定购的各种东西。本来他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可是他还在补充增加。外祖父叫我们任意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我对于那些手帕（我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才拿到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记忆犹

新，因为我尽量把其中的一块保存了40年左右。那块手帕漂亮极了，四边绣着花，颜色是鲜艳夺目的粉红色，上面飞针走线地绣着我们姓名的头一个字母，那种交织绣成的图案是那样花哨，即使是联邦调查局也无法鉴定出它的主人是谁。

我们选好了礼物之后，陪同我们前来的人教着我们向外祖父道谢，然后带着我们走开。我们离开时外祖父吻了我们的面颊，我们总是抱怨他的亲吻弄湿了我们的脸，这招致人们不断告诫我们必须走到他看不见了的地方时才能去擦。这就是他死去之前给我留下的最生动的记忆了。在他死的时候我们房子里所有的帷幕、窗帘都垂下来了，我们穿戴整齐，走过马路。我并不特别悲伤，因为我和外祖父的关系是拘束疏远的，我们祖孙就分别住在马路对面，可是关系是如此的冷漠。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只觉得是参加了一次戏剧般的家庭事件；可是这件事对我母亲却是很重要的。我跟在别人后面，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走到棺材边向里面凝视。外祖父蜡黄的尸体躺在棺材里，样子很可怕。虽然我此后参加过多次葬礼，但我再也不看尸体了。当我长大以后，我强烈地感到对于一个死者的最后记忆不应该是躺在棺材里的僵硬的躯体和整饰过的面容。

我和我的外祖母（我们叫她“奶奶”）的关系也同样是形式上的。通常，我和母亲一起去拜访她，我亲她的面颊，在她面前站一会儿，听她说我又长大了多少，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到别处，直到告别的时候再重复一遍见面时的礼节。我从没有和她真正谈过一次话，或者即使是一次不拘形式的聊天。

她是一位漂亮夫人，她活了94岁。直到她死的时候，她那美丽的红头发虽然已经逐渐退色了，但是一直没有变白。

她的身体挺拔苗条，牙齿完好。我不记得她曾经坐在沙发或软椅上，她总是像一根笔直的标杆似的坐在硬靠背椅上。我猜想她对外孙子外孙女们的评价是凭着她对他们的仪表、穿着和外貌来判定的。至少，我自己只对她说过“早安，奶奶。”或“再见，奶奶。谢谢。”许多年后，她已经很老了，我就加上一句“奶奶，你觉得怎么样？”其实这句话根本不必要，因为她从来 not 生病。

她那在第五大道的房子又大又冷，但也朴素。这处住所的底层有一个很大的门厅，门厅的尽头是一间硕大阴沉的餐厅和一间收拾得很整齐的起居室。用大理石装饰的大厅里放置着一架风琴。圣巴塞洛缪教堂的风琴手吉布森先生在社交季节时来此演奏。大厅的墙壁是由大理石和有彩绘面的嵌板交替着镶嵌的，这些昂贵的彩绘板是从欧洲买来然后割开嵌入大理石之间的空隙的。

我从未去过这座大房子的第二层或其他地方，没去过厨房、食品房和可能是仆人住房的宽大的角落。一个小男孩在那样一座大房子里不会像在家里一样的自由自在。当我走入前门的时候没有人对我说：“弗雷迪，上楼去告诉你外祖母说我们来了。”男管家会说：“你们可以在起居室见到夫人。”要么就是：“夫人马上下来。”我去拜访外祖父母只是一种义务，没有什么令人向往的东西。

我们的住宅也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虽然我对其中的一些房间确实有着美好的记忆。我父亲是位书籍收藏家，他有一间极漂亮的藏书室。藏书室占据了整个房子的宽度，它面向大街。除了一个大壁炉和窗户外，屋子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塞满了书的书架，还有一些书因为装不下而堆到了桌子上。现在，这些书的大部分摆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们

的这座大房子有3个法国式的窗户开向阳台，可以从这里仰视和俯瞰大街上的景色。我和哥哥奥斯古德在这里度过了我们童年中令人兴奋的部分时光。我们的房子距离大教堂只有一条街区，所以是观看圣帕特里克节^①游行的最好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和发生的时候，这里进行过无数次的整装待发的告别游行，身着盛装的军乐队和英勇的士兵就从我们眼前走过。

当我11岁时，有一天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英雄。那时我参加了一个儿童训练团，用军械库里的木枪进行训练，并且在中央公园里“演习”。有一天我穿着卡其布制服，带着武器在第五大道上走着，我看到公共图书馆前面围着一大群人，我有些好奇，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加入到人群之中，看到一个带英国口音的人正在高谈阔论，他在鼓动人们参军，这种表演我后来觉得很像宗教上的福音布道会。讲演的人从那些不积极热心冲向前去要求参军的人们当中看见了我，他的情绪非常激动。

他喊着：“小伙子，到这儿来！”我带着木枪站上了讲台。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始了疯狂的蛊惑人心的煽动，他说：“这个小傢伙都在准备投身战争；而你们这些人却把手插在口袋里，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几分钟以后，我在大道上骄傲地大摇大摆地走向645号，心里觉得如果战争胜利了，我可有着重大功劳。

我妈妈的房间是在房子的三层。她在房间里吃早饭，如果这天上午没课我就和她一起吃。她的房间里有数不清的记事本，上面记录着菜单（不是菜谱），约会时间，音乐会和

① 圣帕特里克是爱尔兰的守护神。——译者